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周作人

ZHOU ZUO REN

代表作

(豫)新登字 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周作人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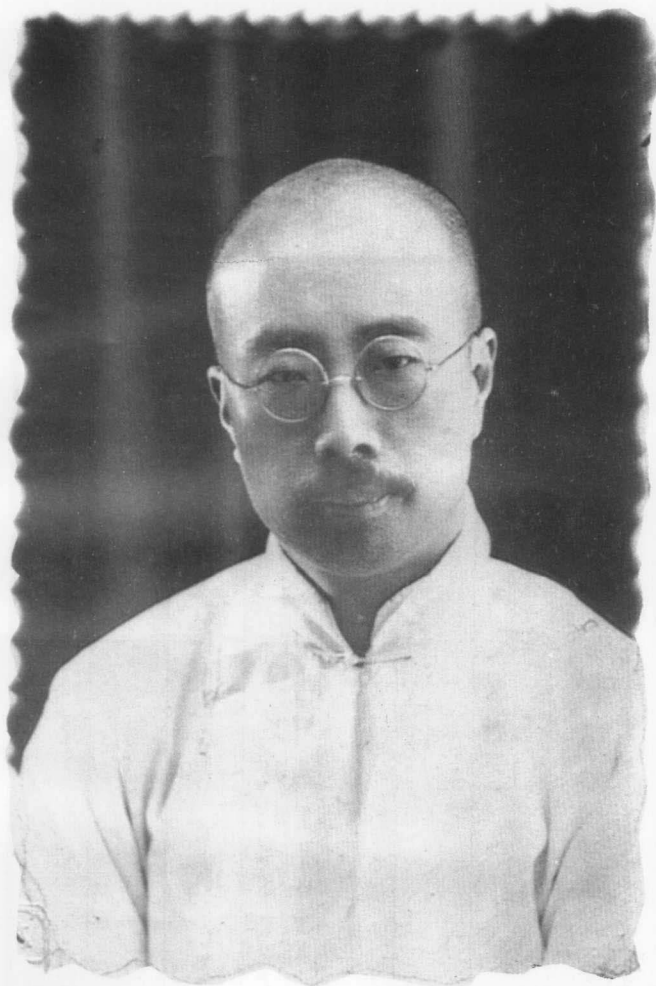
张菊香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1 字数 256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500—12,500

ISBN7-215-01524-6/I·107 定价:14.80 元



作 者

挽中農詩二

苦雨翁

其一

昔時革禍同蒙難，菜飯幽居亦可憐。算

到今年逢百日，

中農被槍七月十四日蒙難則為十月廿四日也寒風一盞

薦君前。

其二

仿時髦的瀏陽體

漫言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徒向
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狼狽。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茨璧

前 言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位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又走了一条曲折、复杂道路的著名散文作家。

周作人出生在1885年，原名灏寿，字星杓，浙江省会稽县（今绍兴）人，鲁迅的二弟。青少年时期，他和鲁迅走过几乎相同的道路。幼年曾在“三味书屋”读书，又在祖父身边读过不少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的著作，受过严格的八股文写作训练。后来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1904年末至1905年初，周作人翻译了《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改名为《侠女奴》，在《女子世界》上连载，后印为单行本。与此同时，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好花枝》、《女猎人》等。这是作家创作翻译生涯的起始。这些著译在当时未被世人注意，现今已难找到。

1906年秋，周作人又继鲁迅之后，赴日本留学。初入法政大学预科，后改入立教大学。在日本期间，周作人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在此期间，他曾与鲁迅一起提

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的新文学。由于他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激”，“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所以当时他们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周作人《现代小说译丛·序言》）。他翻译了匈牙利爱珂摩耳的中篇小说《匈奴奇士录》、《黄蔷薇》，波兰显克微支的《炭画》，与鲁迅合译英国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以及《域外小说集》等，其中多数是弱小民族的作品。此外，他在《天义报》、《民报》、《河南》等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诗文，也标志着他民主主义思想的逐步形成。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返回家乡。曾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科长、本省视学。因病辞职后，又任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员，并被推选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主编了《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在这个刊物上周作人发表过不少著译，并曾结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评论文集——《异域文谈》。

1917年春，经鲁迅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工作。初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纂辑员，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新文学运动发初时期，周作人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他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成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曾参与讨论关于出刊《每周评论》的工作，列席讨论《新青年》的编辑问题，成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的客员。稍后又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辑。1920年末，周作人与沈雁冰、郑振铎等

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周作人执笔，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当年冬，北京大学组织“歌谣研究会”，他与沈兼士共任主任。

“五四”前后，周作人除继续翻译介绍不少日本及西欧一些国家的作品外，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以杂文为主的白话诗文。这些诗文，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迸发着民主主义的思想火花，贯注着浮躁凌厉的战斗意气。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理论上的建树和创作、翻译上的实绩，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而蜚声文坛。

1921年夏秋，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去北京西山碧云寺养病。这时“五四”高潮已过，周作人感到了幻想破灭的悲哀，加以避世养病的机缘，遂使他的思想和艺术情趣开始发生变化。他创作了一些叙事、抒情性的小品和不少山居杂诗、杂信。在这些诗文小品中，他袒露了思想中的矛盾，抒发了在矛盾中挣扎、苦闷的心情。

从1922年下半年起，周作人经胡适推荐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后又兼女高师（后改为女师大）教员。此外，他还先后在华北大学、平民大学、孔德学校、孔德学院、北京一师、二师等校兼课。1923年7月，周作人听信日籍妻子太信子的谗言，与鲁迅断交。九月，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与钱玄同、孙伏园、李小峰等人共同组织“语丝社”，发刊《语丝》杂志，周作人成为《语丝》杂志在北京时期的实际主编。

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反动校长杨荫榆及北洋军

闻政府，哀悼被残害的烈士。1927年在蒋介石制造的反革命清党屠杀事件中，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也曾进行过愤怒的抗争，对事变中无辜被处死的烈士充满同情，还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从“五四”到1927年，是周作人创作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他所结集的作品，除《自己的园地》外，还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上下册、《谈龙集》。译著有《点滴》、《现代日本小说集》、《玛加尔的梦》等等。他的创作以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白话诗文的建设上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并以此而奠定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一方面，从“五四”退潮以后，周作人思想上进与退、斗与隐的矛盾，逐日加深。他曾暗喻自己是“叛徒”与“隐士”的合身，是“流氓鬼”与“绅士鬼”的一体，便说明了他的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创作中，一方面，他的诗文以浓重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坚持着新文化斗争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却又“极慕着作文的平淡自然的境地”（《雨天的书·序二》），创作了一些充满恬淡、闲寂韵味的随笔小品，显示出他创作风格的开始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屈服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高压政策，周作人提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良方”——“闭户读书论”。他说：“此刻……，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实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啞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其次是有了烦闷用方法消遣……就是闭户读

书。”（《闭户读书论》）《闭户读书论》的发表，标志着他十年隐逸生活的起始。

三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仍有不满，但却又漠视无产阶级的兴起，抗拒马克思主义，抵制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他曾攻击无产阶级文艺为“载道文艺”，诬蔑一些作家转向左翼是“投机趋时”。他的文艺主张也随之一反“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而文艺的主张，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他与冯文炳、徐祖正合办的文艺周刊《骆驼草》声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的事”。他自己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写了大量赋得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

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周作人出版的散文集有《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这些作品和平冲淡的风格已臻成熟，文字上也更圆熟老练，但在思想上已少有其“五四”时期创作的“浮躁凌厉”。标志着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散文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已经形成了两大对峙的流派。这时期，他的译著尚有《儿童剧》、《希腊拟曲》等。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没有南下，遂被任命为留平教授之一，又在燕京大学觅得客座教授职务。最初他也想以教授资格蛰居，靠著译教书为业。但软弱动摇的本性，又使他抗拒不了日本人的胁迫和汉奸朋友们的劝诱。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被刺客所袭，未伤。这一遇刺

事件，使周作人恐慌不安，当年寒假一过，周作人便辞去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职务，接任了伪北京大学任命他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聘请。随后又被委任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1年初，原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周作人接受王揖唐等人的劝诱，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其后又兼任了伪北平图书馆馆长。是年五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十周年纪念，周作人随从汪精卫等去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访问。访问结束后又随从汪精卫等一行赴南京，参加庆祝汪精卫“六十大寿”的活动，倍受汪精卫等人的青睐与礼遇。1942年9月在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周作人被选为评议会主席。稍后又在伪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副总监。

1943年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周作人被免去华北政委会常委及教育总署督办的职务。后又被汪伪政府追任为华北政委会委员。伪华北政委会又任命周作人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沦陷期间，周作人曾在敌伪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的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等。这些作品大部分属于读书题跋、笔记；一部分是或有些知识性或全然无聊的闲适小品；一部分则是吹捧日本帝国主义、汪伪汉奸，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汉奸文学。除此之外，周作人这个时期所写的或有些知识性或全然无聊的闲适小品及大量的读书题跋、笔记，早已连讽世的微辞也没有了，多成为炫耀知识、玩弄文字之作，文风上“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

(《药堂杂文·序》)。这些都说明,周作人的创作,也和其政治上一样,已由危机走向末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于北京监狱,后又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狱中他曾作《忠舍杂诗》、《往昔五续》、《丙戌岁暮杂诗》、《儿童杂事诗》、《丁亥暑中杂诗》和集外的应酬及题画诗共约二百多首。这些诗或咏物,或抒怀,大多是五、七言古诗或绝句,多没有公开发表,只《儿童杂事诗》解放后曾在上海《亦报》上连载,后由香港崇文书店照原迹影印出版。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老虎桥监狱。初寄居上海,八月回到北京。出狱后不久,周作人重新执笔撰文,译著作品。他曾在上海《亦报》、《大报》上发表小文数百篇,其中一部分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以后,他又曾为各报刊撰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多篇,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著作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资料。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作品,出版的有《希腊的神与英雄》、《伊索寓言》、《浮世澡堂》、《古事记》等等。

1960年末,应香港曹聚仁约,开始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大型回忆录《药堂谈往》,逾两年完稿,于1974年易名《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书中他回顾了自己一生所走的道路,记载了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67年5月,周作人病逝于北京,走完了他83年生命的历程。

周作人在创作上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五四”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而这与周作人等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周作人同鲁迅、谢冰心、朱自清等人一起，以辛勤的劳动，共同浇灌了“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的现代白话散文的早春之花，宣告了文学革命在散文创作领域里的胜利，奠定了散文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成熟的散文艺术的风格——平和冲淡的风格。其影响所及形成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周作人这种散文风格，其具体特色是：

（一）、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周作人的散文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它不同于鲁迅的透彻犀利，不同于朱自清的工笔精雕，不同于谢冰心的委婉清丽，不同于郁达夫、巴金的激情奔泻。他的散文用笔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谈，娓娓道来，无所拘羁。乍一读，似感结构上并不那么严谨，但细细品味又觉作者是有其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显得枝蔓。因而读他的散文不觉得拘谨，不感到板滞。好像与老朋友在一起毫无拘束而又极有兴味地闲谈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能使你触着某种妙理，从而反复咀嚼体味，以致长留记忆之中。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曾谈到浙江地方文艺传统的特性，他说：“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

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默，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这或者也恰好可以说明他的散文和鲁迅的杂文不同的艺术个性吧！如《碰伤》一文，作者意在抨击北京反动军警任意殴打在新华门前索薪的教职员，然而文章起笔却似随意闲谈：“我以前曾有一种计划，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继而作者又谈到佛经里说蛇的几种毒中最厉害的“见毒”，谈到《唐代丛书》中《剑侠传》所写的剑侠的飞剑可“取人头于百步之外”。之后，作者才引出：“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的事，而进入本题。文章好像信笔所之，随意漫谈，其实作者用笔却能纵能收，能放能擒，文章飘逸而不芜蔓。

周作人散文用笔上这种飘逸洒脱的特色，显然是得力于他渊博的知识的。周作人曾主张文章“须放荡”。（《文章的放荡》）然而文章要写得“放荡”，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作者丰富广博的知识和挥洒自如地运用这些知识的本领。他的散文常常是在中外古今、广征博引之中来论述问题、阐述事理的。而且这种论述和征引，又是那么熨贴自如，全如信手拈来，毫无持重、吃力之感。他能借易卜生的戏剧而抨击中国社会上封建僵尸之多（《重来》），又可从《聊斋》和《夜谈随录》的故事引申开来，嘲讽现社会上附在许多活人身上的种种野兽和死鬼（《我们的敌人》）。他能由四世纪希腊厌世诗人的小诗及西方传说中凤鸟的“轮回”而论及对“死”的看法（《死之默想》），又可从英国割本德和苏俄驻挪威公使科隆泰的著作谈到妇女解放问题（《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他能借优美的传说和庄严的圣典以及中外古今的诗

作，把“苍蝇”这种并不可爱的东西，赋写得饶有趣味（《苍蝇》）；又可借外国的生物学著作、中国记写禽言的古典，把平凡的鸟声抒写得生态盎然（《鸟声》）……。

这种中外杂陈、广征博引而形成的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使周作人的散文有一种摄人的魅力，读了它，不仅能给人以艺术的美的愉悦而且能得到广博的知识的陶冶。

然而，三十年代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又常常因思想内容的贫乏和空虚，而一味的征引典籍、杂陈古今，显得有些掉书袋，卖弄学问，甚至有些篇章给人以不堪卒读之慨。

（二）、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

“五四”时期，周作人所写的随笔、杂感，虽不无浮躁凌厉、激昂抗争之作，但随着他的创作风格向平淡闲适的转化，其散文创作中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也日趋鲜明。周作人自称是一个“极缺少狂热的人”，他的散文缺少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和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像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把蕴蓄于衷的激情舒缓地、有节制地、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地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平和、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如《故乡的野菜》一文，作者没有正面地去叙写对故乡的怀念，却淡淡地说：“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然而，在这徐舒的、淡淡的叙写之中，却贮满着一种对故乡的眷念、依恋。接下去，作者又以清丽的笔致，通过对故乡野菜的记叙，淡淡地、隐隐地流露出一种思乡的情怀。又如在《初恋》中，作者写少年时代寄寓在杭州时的一次初恋：“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

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所无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在娓娓的叙述中，作者抒写了少年时代一段情感的波澜，在恬淡中流露出真挚，在素雅中显出深情。令人读后，余馨缭绕，回味无穷。结尾处写听说“她”的死：“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闲闲的两笔，叙写了蕴蓄于衷的感情，婉曲而有节制，清淡却饱蕴感情，充分表现出周作人散文浓郁而以平淡出之的抒情特色。

抒写爱恋的感情时是这样，抒写憎厌的感情亦复如此。在《北京的茶食》中，作者通过记叙在古老的北京城而吃不到好的点心，对军阀统治下中国人民干燥粗鄙的生活表示了一种淡淡的激愤：

“难道北京竟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的点心。”

用平静、委婉的叙述，含而不露地表现了作者的不满和激愤，似显若隐，似有若无，显示出一种徐舒、隽永的韵味。

即使是表现比较强烈的愤激感情，周作人的散文也常常是有节制的、平心静气地去表露的，而不是直落落地宣泄情感的激流。如记写“三·一八”惨案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中，作者平心静气地叙述了“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件“是哀悼”，第二件“则是惋惜”。作者记述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两位举行棺殓，也是用冷静的、客观的叙述的笔调：